

# *Book Review*

## 書評



Taiwa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通識教育學刊》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書評：

追求大學教育的真精神——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介紹

**Book Review:**

**In Search for the True Spirit of University — A Review of  
Ping-Yuan Chen's *Ten Lectures about Chinese Universities***

方永泉

Yung-Chuan Fang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方永泉 Yung-Chuan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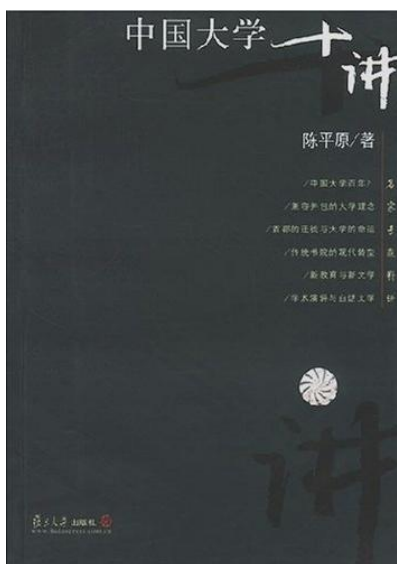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No.162, Sec. 1,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10, Taiwan (R.O.C.)

## 追求大學教育的真精神 ——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介紹



書名：中國大學十講

作者：陳平原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

### 壹、前言

為著追求所謂的「卓越」，近年來國內的大學逐漸走向專業化、企業化的方向發展，然而在知識生產的激烈競逐下，不少學者對於大學教育的本質也開始有所反思：「到底大學教育的真正目的為何？」「大學教育到底能夠帶給我們學生的生命有什麼重要的影響？」也因為學者們對於大學教育的根本精神有著更多的深度反省，因此能夠提供另類視野及想像的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又重新回到了有關高等教育討論的熱點。

而國內的一些大學（例如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及東海大學）在這股重視通識教育的熱潮中，紛紛推出了書院或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的制度，以進一步落實通識教育的推動。雖然「書院」此一名詞與中國教育史上著名的書院教育制度相同，然而細究起來，國內大學此波對於書院制度的建立，似乎仍較偏向於國外大學傳統的「住宿學院」制度，其中特別是國外一些著名的老牌大學，如英國的牛津、

劍橋，甚至美國的哈佛與耶魯大學等。的確，國外這些著名大學的住宿學院制度行之有年，累積了龐大的實際經驗，加上「住宿學院」的規模不大，屬於全人教育的性質，一方面可避免大學為追求有效運作所產生的科層體制之限制，另方面又可營造較為溫馨的學習氣氛和師生關係——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即聞名於世，讓學生得以有著更為廣博學習的空間，收效不錯；是以引入此項制度，對於國內的大學教育的確可以產生不小的功效。

而國內大學在引進此項制度時，亦不約而同地均以「書院」為名，例如政大書院、清華的厚德書院與載物書院，以及東海的博雅書院，「書院」之名，這些都顯示了，在中國脈絡的影響下，我們在思考大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時，可能還是無法完全擺脫歷史傳統的影響，甚至可能還必須從某些傳統中「取經」。「書院」作為一種教育制度，在中國已有千年傳統，不過在清朝末年卻戛然廢止。在當時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情勢下，傳統的書院承擔了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的教育責任，因而在清廷變法維新的企圖下，所有舊式書院一夕之間改為新式學堂。至此之後，中國從清末到民初，所推動的種種教育制度，基本上與過去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完全切斷了聯繫，包括大學教育在內。當今的中國及臺灣的現代大學，若說與幾千年以來的中國的傳統高等教育有什麼關係，恐怕只有名稱部分（大學與太學）頗為類似罷了。

前述的發展，到了今日似乎又有了轉向的趨勢，如前述之在現今大學走向專精化、績效化的背景下，為了矯正大學教育朝向某一極端發展所生的問題，除了引發有識者對於大學精神的重新思索外，也不禁讓人聯想到，人類社會中所謂的高等教育或大學，難道真的只有西方的中世紀大學傳統，卻沒有其他的遺緒可以作為現代大學的參考乃至針砭呢？對於中國乃臺灣社會來說，以往在民間盛極一時的書院教育難道真的不值一晒、一無是處嗎？

在前述的提問背景下，大陸著名文史學者陳平原寫成了《中國大學十講》一書，討論了中國大學的歷史背景及種種問題。雖然這本書並非具有系統性及邏輯性的學術專著，然而透過作者的生花妙筆，娓娓道來，也許本書並非專論而較屬於隨筆的性質，如此情況下，卻也使得讀者對於當代中國大學的傳統與歷史發展，有著一個全面但又不會流於膚淺的認識。

## 貳、本書成書背景

### 一、作者學術背景

雖然本書主要以北京大學作為主要的個案對象，不過陳平原並非「道地的」北京人或北大人。陳氏 1954 年生於廣東潮州，1978 年入中山大學中文系，1984 年於中山大學獲文學碩士，1987 年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是北京大學最早的兩位文學博士之一。從陳平原的求學歷程來看，碩士之前是在廣東的中山大學，博士階段才至北大攻讀，不過取得學位後，就在北大服務，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其與北大仍然關係匪淺。陳氏在本書中曾述其與北大的關係：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博士的全部課程）來，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為有別的大學就讀的經驗，我對北大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既充滿敬意，又有點不以為然。（頁 187）

從這種與北大很接近，但是又非「全」北大人的情況，遂使得作者能夠維持某種「批判性的距離」。

從《中國大學十講》的內容來看，應與中國教育史關係最密，不過教育史其實並非陳平原的主要學術背景。陳氏最初研究方向著重在現代中國文學，爾後他又逐漸擴展研究領域至古代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到上一世紀的 90 年代後，更開始關注現代中國學術史，並兼及現代中國教育史。

於是，我進入「歷史」與「文學」的中間地帶，廣泛搜集並認真鑒賞起「老北大的故事」來。（頁 188）

這種悠遊於歷史及文學間的身分，似乎也為陳氏開發了一個更廣大的研究領域，他的著作量相當驚人，而且應該也是位頗受歡迎的作家，依照筆者網路概略蒐尋的結果，至 2006 年止，至少便有專著及論文集 17 種以上。而在有關大學教育的論述方面，除了本書（2002）外，尚有《老北大的故事》（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大學何為》（2006）等著作。

## 二、對大學教育的看法

陳平原之所以關注大學教育，按他自己的說法，與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史專家不同：

我之所以談論大學，一半是學術史研究的延伸，另一半則是出於對自身生活環境的好奇。（頁 220）

從陳氏的學術背景來看，因其長久浸淫於中國學術史的緣故，所以關注焦點延伸至中國教育史與大學教育，應該頗為自然，而且由於其專長在中國的學術思想，故陳氏對大學教育的看法，也不會完全採擷西方學者的觀點，他就強調中國的大學仍應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情境。例如他在另著《大學何為》的〈大學三問〉一文中，提及：

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大學何為》，頁 186）

他又說：

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大學何為》，頁 190）

除了植根於自己學術的歷史背景外，陳氏的生活及成長環境，也使他對於中國大學歷史及精神的理解，主要限於下列六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已經消逝的嶺南大學、燕京大學和西南聯大。其中尤其是北大，更可說是本書中最重要的個案，本書中許多篇章皆與北大有著密切的關係。

簡言之，在陳平原的主張中，大學的建立應與其所處的社會及歷史傳統脫離不了干係，以在中國而言，現代的大學發展應該仍可借鑑於傳統的書院教育；而大學的角色也不能自甘於「學術象牙塔」，更應強調學術的責任，大學必須要能對於帶動其所處之地方及社會根本的改革；而大學的改造，更不應該只是全盤移植的結果，卻是植根於自己成長之土壤茁壯成長的結果。基本上，陳氏在《中國大學十講》的論述離不開這樣的論述主軸。

## 參、本書各章要點

雖然陳氏自謙「業餘選手」，然而其實力較之「專業選手」並不遑多讓，從本書裡多處內容即可見端倪。本書主要分為十章，論述的範圍包括中國大學百年來的發展、蔡元培的大學理念、兩所「首都」大學（北京大學與南京中央大學）的比較、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中心）、新文學與新教育、學術講演

與白話文學等，其他尚包括多篇專書的序言，並藉著這些序言的撰述，回顧了一些名校（北大、中山大學、南開、西南聯大）的一些舊事。不過本書各章篇幅不一，超越卅頁以上者計有第一章、第四章到第七章，從不同章別的份量頁數，也可看出作者著墨的重點。

在第一章中，陳氏先從「中國大學到底百年還是四千年？」問題出發，次再討論到現今的中國大學除了「旁採泰西」外，是否可有「上法三代」的作法？之問題。主張中國大學有四千年者，主要多為中國教育史學者，其主要著眼於中國古代確有三四千年的高等教育，而且「大學」（太學）此一名稱在中國古代即已存在；但認為中國大學僅有百年者，主要則著眼於中國 20 世紀所出現的大學制度，其實屬西文中的 university，而非中國古代的太學，是以應為道地的舶來品。陳氏在本書所採取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實無需將現今中國的大學制度上溯至數千年以前，否則一些自清末以來出現的教育問題將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同時也無法說明在中國大學中一直存在的「兼採泰西」與「上法三代」之間的張力。陳氏之所以採此立場，主要還是為著一種敘事的方便，並非他個人的大學理想，畢竟現代中國的大學與中國古代的太學、書院之間有著巨大差異是一事實，我們也不可能抹殺這種事實。

另外，作者在本章論述中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思考方向——中國的大學在「旁採泰西」上殆無疑義，然而究竟有沒有做到民初某些學者所主張的「上法三代」呢？照他的觀察應該是沒有，其中特別是能夠象徵中國高等教育傳統精神的書院制，更始終未曾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本章的最後，作者雖未明白指出中國大學未來發展的「路在何方」，然而他引用了蔡元培「兼容並包」大學理想（本書第二章即對此有所論述），認為大學應該：

協調西方體制與傳統精神、政府行為與民間學術、人文修養與專才教育、  
學校規模與教學水平、思想自由與相容並包。（頁 38）

除上述工作外，作者也強調在中國的大學中更應思考傳統書院在現代中國的命運，以有助於未來大學的發展；而我們從這些觀點中或可察覺到作者的真正意圖。

本書的第三章中主要比較了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在民初時作為「首都大學」的異同處，雖然篇幅不大，然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高等教育其實並非北大一枝獨秀的實際情形。在第四章中則介紹了傳統書院在 20 世紀中國的現代轉型，其中特別是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專）的建立及發展情形。無錫國專這所「書院式的學校」，創建於 1920 年，1950 年因經費短絀被併校而消失，30 年間培養出許多文史研究方面的傑出人才。雖然以國學為中心，但這所學校在課程設置及講課方式上並不同於一般大學的中文系或歷史系，而更接近傳統書院的教學。讀過無錫國專的校友，在回憶起母校時，都會想起下列四點：修心養性、專書教學、



書聲朗朗與作文比賽。而借助「熟讀精審、循序教育、虛心涵咏、切己體察」的十六字工夫，既實現了性情教育，又完成了學業訓練，奠定了師生「繼絕學」的使命感，這可說與現代大學分科別類的教學方式有極大的差異。

本書的第五章談的是民初大學教育中「新教育」與「新文學」之間的關連。以往在談論五四的文學革命時，多半集中在報刊書局的鼓動風潮，然而陳氏卻另闢蹊徑，他是從文學教育的改變，也就是從新式學堂的科目、課程、教材的變化，探討新一代讀書人的「文學常識」。陳氏的基本立場是，文學教育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途徑，必定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一個時代的文學走向；而在文學教育中，又以「文學史」的教學及著述傳統對於文學教育的影響最大，因為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既需要有新學制的支持，也需一代代學人的努力實踐。因此，在本章中陳氏遂以當時北大課堂教學中的「桐城」與「選學」之爭，以及中國文學門的課程表為例，來說明文學教育與文學革命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則探討了 1922 年時，四位知名的文化人：章炳麟、梁啟超、胡適及周作人分在四個不同的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處所作的學術演講。陳氏的觀察是，這四位大學者在四座大城所進行的各場講演，「構成了 1922 年中國思想文化界一道絢爛的風景」（頁 153），雖然各人的論題不一（章談國學、梁說作文，胡表彰國語文學、周則推薦小詩），表面上看毫無關係，然而在某些環節上（如白話詩或白話文學的評價）的相互指涉，讓四人之間產生了交集。這四人當中，章與梁，雖屬於較為傳統的文化人，然而儘管章質疑無韻的白話，梁批評《水滸傳》與《紅樓夢》作為中學教材，但並沒有否定白話文發展的大方向；胡與周屬於新文化人，但胡堅持中學必須以白話文教學為主，周作人強調現代漢語仍應採納古語。四人立場或有差異，但在白話文教育及審美功能的認識上並非真正的論敵。陳氏認為，這四大學者在 1922 年所進行的「學術性」演講，其實促成了「白話學術」的出現，使得人們了解到，白話文亦能用以表達深邃的學術思想；其不只代表了五四前後兩代學者在學術史上的交接，也使得白話文確立了主要文學及學術語言的地位。而從筆者的角度來看，本章分外具可讀性，一方面陳氏關於四大學者演講風采及軼事的描述十分生動詳盡，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一項特殊的文學史研究途徑，亦即從知識傳播的角度（學術演講）來探討中國的白話文學革命，頗值得一般人士及學術工作者詳加閱讀。

從第七章開始，主要是陳氏對於一些名校軼事之回顧，其中以第七章談到北大的內容最豐富，在該章中陳氏說明了自己的研究策略——為了兼顧「宏偉敘事」和「小品筆調」，所以選擇了「回到現場」的策略——所謂「回到現場」，指的是重視那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研究材料，包括雜感、素描、隨筆、小品、回憶錄、新聞報導、檔案材料等資源，而研究範圍可能多為瑣碎的生活場景與軼事，這些材料

可能不為傳統史家所重視，卻是了解「校園裡的真精神」、進入老北大的必要門徑。第七章關於北大諸多軼事有著細節性的描述，例如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初始創建時的諸多弊端，以及民初時北大學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的意識等，都頗值得讀者一探。此外，讓筆者印象較深的是，作者在本章中也將北大與清華視為兩種教育思想的代表，清華強調「整齊劃一」，重視教學的標準化；而北大強調獨立、自由，對於課業的要求不高，甚至有些鬆散。「但北大之『鬆』卻變成了一種預防疾病的抗毒素」(頁 205)，反而能夠培養出注重獨立思考的特殊人才來。筆者認為，北大的「鬆」其實在一般的頂尖大學(指學生的程度頂尖)裡並不難見到，例如在臺灣的臺大學生即常拿來與清華或是成功大學來相比而被認為過於「鬆散」；這種「鬆」一方面代表了頂尖學子的傲氣，另外也象徵了其對於獨立自由的嚮往；但「鬆」並不應該意味著對人群的冷漠以及與世界的孤絕，相反的，它應該容許或是能夠發展出學生對於社會及政治的強烈參與感，否則它就不是代表真正獨立與自主的「鬆」。至於本書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則分別談到了其他的重要學府，內容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仍可幫助讀書對於當時的大學「風景」增添一番認識。

## 肆、結語

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到作為一位文史的學者，陳平原所關注的層面其實是相當廣泛的，他尤其重視教育對於整體學術思想發展的影響，而這也是他之所以轉向至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他說：

從事學術史、思想家、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因為，百年中國，取消科舉取士及興辦新式學堂，乃值得大書特書的「關鍵時刻」。(頁 2)

又說：

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頁 3)

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確必須要明瞭、正視教育對於國家發展、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演進的「關鍵性」影響，如此才能在國家社會的進步面臨重大抉擇時，做出正確的判斷及選擇。

自謙為「業餘選手」的陳平原，從他專精的文學史領域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史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相當有創見的觀點，例如他探討了清末種種新式教育及考試方面的

改革措施（如開辦大學堂、公布癸卯學制、諭停科舉、建立學部）後，認為百年中國，以教育而論，最關鍵性的轉折，其實是在清廷手中完成的；而在晚清的學制建設方面，其認為最關鍵的影響仍是來自於德國，民初之後才改至受到美國的影響。另外他也提出，晚清開始的教育改革，幾乎每一步都是外力逼迫而成的，其對於傳統教育多半有著「無裨實用」的強烈批評，但也由於西學、西式教育的強勢立場，使得傳統教育論者有所反撲，至此之後，「如何防止西學的引進導致傳統倫理道德的顛覆？」遂成為教育界持續百年的論爭。甚至於，他從學術傳播、知識生產的角度，重新賦予中國近代教育改革新的意義及新的研究角度，凡此種種，對於我們重新梳理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歷程都頗有幫助。

陳氏在本書中另外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對於大學「校園裡的真精神」的闡發。不容否認的，在中國（臺灣社會亦然）大學目前依舊被歐美模式主宰的情形下，我們可否藉由傳統的教育制度尋找教育的智慧及本質，重新省思另外一種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可否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大學之路來？在這些問題的回答上，本書確實可提供給我們一些啟發。本書雖未指出一個明確的解答，然而透過各章節的撰述，其方向已隱然成形；而在另一篇未收入本書的〈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廿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收入《大學何為》）一文中，陳氏就指出了傳統書院教育應可提供某些思想資源：

（1）從教育體制考慮——私立大學、研究院及民間學會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多元化的貢獻；（2）從教育理念考慮——全人格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實用主義傳統；（3）教學方法考慮——強調獨立思考、自學為主、注重師生之間的理解與溝通（《大學何為》，頁20）。

準此，書院教育對於大學教育的體制多元化、全人教育乃至師生的關係上皆可提供不少的參考。

當然，在現今的社會中，書院制度要能完全取代大學的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包括書院組織過於簡單、易於形成相對立的學風、乃至對於教師資格的要求甚高、學生的出路問題、經費來源等等，都是不易解決的問題。然而如何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下，做些局部的調整，在我們對於書院的制度、教學方法與師生關係有著更深入的認識後，讓書院制度的優點（強調因材施教、人格修養、重視師生情感交流）得以融合入現今的大學教育中，卻也應該是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所可努力的一個方向。

